

我国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实证研究

孟范昆¹, 刘东皇², 朱晓俊³

(1.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商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3. 滁州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 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公共(支农)支出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基于规模、结构和区域性特征视角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支农支出并未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公共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限制了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未产生挤入效应。依据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公共支出; 公共支农支出; 消费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047-0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Effec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in China

MENG Fankun¹, LIU Donghuang², ZHU Xiaojun³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2.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est potential in expanding the domestic demand lies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rural household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ale, structur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consumption in China. It shows that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hasn't had significant crowding-in effects on rural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al has impeded its consumption effects and in central areas the public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hasn't had crowding-in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public expenditure; public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consumption effects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增强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急迫课

收稿日期: 2012-10-20

基金项目: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新进教授、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编号: KYY11043)

作者简介: 孟范昆(1955-),男,江西景德镇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非公有制经济。

刘东皇(1980-),男,福建南平人,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朱晓俊(1980-),男,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制度。

题。消费需求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组成,居民消费增长长效机制的建立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最重要内容。在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体系中公共支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既可能产生“挤入效应”,^①也可能产生“挤出效应”。^[1]在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问题上国外学者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如 Ho^[2]和 Kwan^[3]等,Ho 运用多国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后认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二,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如 Karras^[4]和 Neih and Ho^[5]等,Karras 也利用多国数据却发现公共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从而扩张居民的消费支出,且这种挤入效应的强度与政府规模呈负相关关系。如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效应,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扩张居民消费有利;要是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挤走居民消费,财政政策的消费效应将大打折扣。

由于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在国外并无定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也进行了实证检验。谢建国和陈漓高基于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认为在短期内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在长期均衡时公共支出完全挤出了居民消费。^[6]李永友和丛树海基于居民最优决策行为,通过构建中国加总社会消费函数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反而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7]在公共支出转型过程中,考察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更应注重从结构角度进行研究。基于总量和结构视角刘东皇和沈坤荣的实证研究认为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公共支出的规模扩张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其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社会文教方面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8]苑德宇、张静静和韩俊霞的研究也表明科教文卫支出挤入居民消费,其余方面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并不存在或不显著,且同类支出的消费效应在地区间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9]公共支出消费效应的结论虽存在差异,但几乎都认同公共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分别从总量、结构或区域特征视角国内学者对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考察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却较少。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沈坤荣和张璟从总量和结构方面间接地分析了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10]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在其支出结构上,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目标偏差,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从而限制了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基于地方公共支农支出视角,朱建军和常向阳^[11]及储德银和闫伟^[12]则认为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利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李晓嘉基于 1952—2008 年的时序数据也认为公共支农支出总体上对农村居民消费虽然起到了挤入作用,然而基于 1995—200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则发现各分类支出的消费效应存在差异。^[13]不同区域里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是不同的,李燕凌和曾福生基于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运用 1994—2003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只有在东部地区比较明显。^[14]

基于已有的文献,本文分别从总量、结构和区域特征三个视角系统地检验我国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以期宏观政策的调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公共支农支出的现状特征:统计描述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公共支出规模持续膨胀,从 1978 年的 1122.09 亿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76299.93 亿元。与此同时,公共支农支出的规模也在不断膨胀:1978 年的公共支农支出仅为 150.66 亿元,2009 年公共支农支出已高达 6720.41 亿元。然而,从公共支出支农力度上看,公共支农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并未呈上升趋势,其在波动中持续下滑(见图 1):1978—1980 年公共支农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13.43%、13.60% 和 12.20%,1981—1999 年公共支农支出占比几乎处在 8%—11% 区间波动,进入 21 世纪后,其占比在 7%—8% 区间波动,2009 年公共支农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为 8.81%,30 年间约下降了 34.4%。

公共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 3 项费用和农业救济费等四个部分。在公共支农支出的结构方面,各项公共支农支出持续增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 3 项费用和农业救济费分别从 1978 年的 76.95 亿元、51.14 亿元、1.06 亿元和 6.88 亿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2161.35 亿元、504.28 亿元、21.42 亿元和 182.04 亿元,分别增长了约 29 倍、9 倍、19 倍和 25 倍。从各项支农支出占支农支出的比重上看(见图 1),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是第一大公共支农支出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其比重的均值约为 67.13%;农林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的均值约为 25.23%,为第二大公共

① 在相关文献中挤入效应也称两者的互补关系,挤出效应也称两者的替代关系。

支农支出项目;而农业科技3项费用和农业救济费用所占比例均较小,两者之和都不到10%,其中农业科技3项费用占比最低,其比重变化幅度不大,持续低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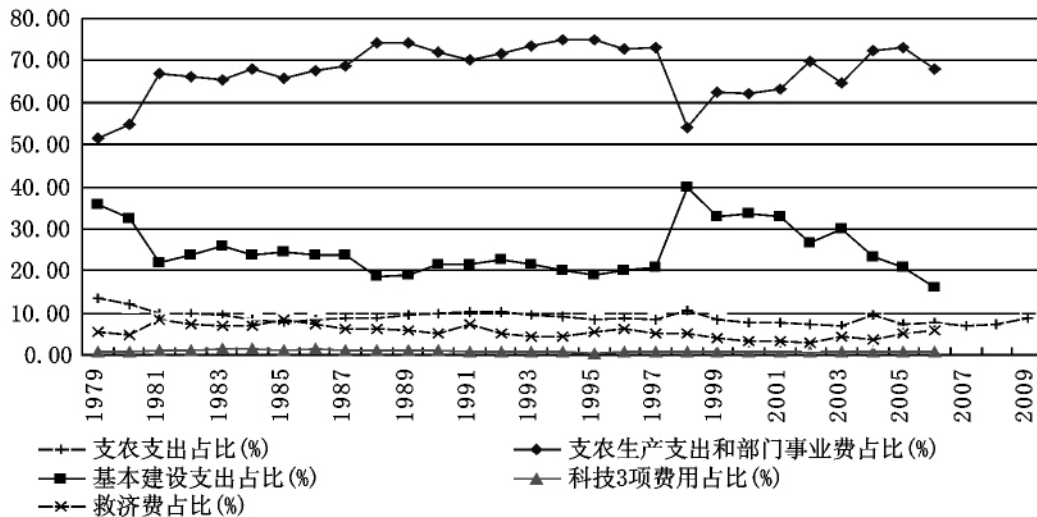


图1 公共支农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及各项支农支出占公共支农支出的比重(%)

注:原始数据皆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由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公共支出结构和之前的数据不可比,2006年后的公共支农支出用农林水事务支出替代,数据上也基本都保持了连贯性,而公共支农支出的内部结构数据却缺失。

公共支出由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当前除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国防等少数公共支出项目主要是中央财政负担外,其余大部分项目一般由地方财政担负主要职责,公共支农支出的大部分资金就是由地方财政担负。因此从地方公共支农支出角度分析公共支农支出的区域特征是合理的。我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和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部逐级递减的梯队结构,地方公共支农支出存在着区域性的特征。

1999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本文分别从公共支农支出规模增长率和公共支出支农力度两个指标分析公共支农支出的区域特征。从公共支出支农力度指标看,东、中、西部地区1999-2009年平均公共支出支农力度分别为5.66%、7.70%和8.65%。这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工业化程度越高,农业在当地经济中相对地位就较弱,地方公共支出的支农力度就越弱。从公共支农支出规模增长率这个指标看,东、中、西部地区2000-2009年平均支农规模增长率分别为25.49%、32.39%和30.90%,这表明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公共支农支出规模的增长都超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9年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占其公共支出的比重超过西部地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公共支农支出持续增长的背后存在以下几个事实:一、公共支出支农力度持续下滑,这表明公共支农支出与公共财力的增长并不匹配,公共支农资金的增长低于公共财力的增长,在公共支出结构中公共支农支出的地位下降,公共支农支出总量仍相对不足。二、公共支农支出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共支农支出项目主要集中在部门的事业费和农林基本建设支出,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所占比重非常低。三、公共支农支出存在着区域性特征,虽然中西部地区公共支农支出的增长快于东部地区,然而工业化程度越高,地方公共支出的支农力度则相对越弱。

三、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实证检验

自Bailey(1971)将政府支出纳入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研究者们都一直关注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Barro(1981)拓展了Bailey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模型。Aschauer(1985)进一步拓展了Barro的研究,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框架中把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到了现代消费理论。此后的许多研究(Ho,2001;等)都是在这种分析框架内进行不断的完善。基于公共品和私人消费品的最优选择框架,本文分别从总量、结构和区域性特征视角实证检验我国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

(一)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总量和结构视角

在检验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方面,基于仅考察公共支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依据前

人的理论模型我们在计量检验时控制的是公共支出这个变量, 双对数计量模型的估计形式为:

$$\text{模型一:} \quad \ln C_t = \alpha + \beta \ln GE_t + \theta \ln GNE_t + \mu_t \quad (1)$$

在考察公共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时, 将控制变量改为公共支农支出, 模型一则可以拓展为模型二:

$$\ln C_t = \alpha_0 + \alpha_1 \ln GNE_t + \gamma_k \ln GNE^k + \varepsilon_t \quad (2)$$

其中 C 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 GE 为人均实际公共支出, GNE 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公共支农支出, GNE^k 为公共支农支出的内部构成, 其中 $k=1, 2, 3$ 和 4 分别表示为 SYF (人均实际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JJ (人均实际农林基本建设支出)、 KJ (人均实际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和 JF (人均实际农业救济费)。

公共支农支出及其内部构成的数据同图 1, 由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2006 年后的公共支农支出用农林水事务支出替代, 之后的公共支农支出内部构成的数据缺失, 公共支农支出内部各分类项目的数据只延续到 2006 年。因此, 模型一的样本区间为 1978—2009 年, 模型二的样本区间为 1978—2006 年。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直到 1985 年才有统计, 这里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衡量通胀, 以 1978 年为基年。原始数据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所有变量数据皆经过相应的调整从而获得人均实际值, 并采用对数的形式。

为避免伪回归, 首先需要对样本各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见附表 1)表明各变量数据均为 $I(1)$ 过程, 然后运用 Engle—Granger 检验方法对各模型回归后的残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见附表 1)表明我国公共支农支出及其内部构成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 1 公共支出规模及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模型类型	一		二		
常数项	3.3659* (7.4022)	114.7803 (0.0166)	126.1809 (0.0135)	21.2667 (0.1346)	58.3939 (0.0575)
$\ln GE$	0.4854* (5.3750)				
$\ln GNE$	-0.0092 (-0.1481)	-0.0280 (-0.3660)	-0.0291 (-0.2566)	-0.0420 (-0.7430)	-0.1230 (-1.5651)
$\ln SYF$		-0.0100 (-0.0965)			
$\ln JJ$			-0.0005 (-0.0103)		
$\ln JF$				0.0229 (0.8193)	
$\ln KJ$					0.0788*** (1.7266)
AR(1)	1.2720* (8.0500)	1.4895* (8.6274)	1.5484* (8.8088)	1.5550* (8.7045)	1.2970* (6.6889)
AR(2)	-0.4193* (-3.1038)	-0.4899* (-2.8789)	-0.5487* (-3.2009)	-0.5569* (-3.1832)	-0.2979 (-1.5424)
Adj-R ²	0.9940	0.9907	0.9908	0.9911	0.9910
D-W 值	1.4040	1.7717	1.8910	1.9815	1.3302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 t 统计量, * 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表示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未带 * 表示未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下表同。

估计结果显示: (1) 在总量规模方面, 农村居民消费对公共支出的反应系数为 0.4854, 显著为正, 这表明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这和人前绝大多数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但控制公共支出变量后, 却发现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显著, 表明公共支农支出并未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 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十分显著。^[10] (2) 在结构方面,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农业救济费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不显著, 在支农支出结构中唯一具有显著影响的是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且系数为正, 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从我国公共支农支出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上看, 科技三项费用占公共支农支出的比重持续走低(不到 1%), 其增长相对

缓慢显然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支农支出的社会福利功能,因此,这应是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区域性特征

公共支农支出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对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区域性特征分析本文从总量规模角度进行,由于公共支农支出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用地方公共支农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将模型一进一步拓展为适用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三:

$$\ln C_{it} = \alpha_{it} + \beta_{it} \ln GE_{it} + \theta_{it} \ln GNE_{it} + \mu_{it} \quad (3)$$

i 为区域标志,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2000—2010 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 1999—2009 年,以 1999 年为基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价格的影响,各变量皆为人均实际值,样本总数为 341。

面板数据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模型的类型,我们运用协方差分析检验法^①进行 F 检验(见附表 3),在显著性水平为 1% 下,查表后我们得出各区域模型的 F_2 值都大于其临界值,而 F_1 值皆小于其临界值^②,因此计量模型皆采用变截距模型。对变截距模型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问题, Hausman 检验结果(见附表 4)表明东部地区样本适用随机效应模型,而中、西部地区的样本适用固定效应模型。确定模型类型后,最终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表 2 区域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样本类型	东部	中部	西部
常数项	4.7337* (25.3468)	4.1493* (21.6657)	4.6603* (26.1370)
$\ln GE$	0.3725* (10.7955)	0.5057* (11.3798)	0.3357* (8.6177)
$\ln GNE$	0.0674* (3.3490)	-0.0378 (-1.3918)	0.0446*** (1.8882)
Adj-R ²	0.9471	0.9510	0.8887

注:对东、中、西部的划分见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反应系数在东、中、西部皆显著为正,这表明地方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这和前面的研究结论还是吻合的。控制地方公共支出变量后我们发现地方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的特征:东、西部的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却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中部地区的省份几乎都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其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挤入效应不显著,显然影响到全国层面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挤入效应。因此,从地方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区域差异上看,虽然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增长相对较快,但中部地区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效应不显著,这也是我国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具有显著挤入效应在区域上的一个重要表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公共品和私人消费品的最优选择框架本文分别从总量、结构和区域性特征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得到如下三个主要研究结论:

(1) 在总量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公共支农支出的规模持续增长,但由于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公共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公共支出支农力度持续下滑。在公共支出支农力度持续下滑过程中,公共支农支出并未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显著的挤入效应。

(2) 在结构方面,公共支农支出项目主要集中在部门的事业费和农林基本建设支出,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所占比重都非常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最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林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农业救济费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农林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

^① H_1 : 混合回归模型; H_2 : 变截距模型。协方差分析法是检验假设 H_1 和 H_2 是否成立。 $F_2 = \frac{(S_3 - S_1) / [(N-1)(K+1)]}{S_1 / [NT - N(K+1)]}$, $F_1 = \frac{(S_2 - S_1) / [(N-1)K]}{S_1 / [NT - N(K+1)]}$, 其中 S_1 、 S_2 和 S_3 分别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F_1 和 F_2 服从特定自由度的 F 分布。在某显著性水平(如 5%)下,如果统计量 F_2 大于 F 分布临界值,则拒绝假设 H_1 ,反之则选用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当拒绝 H_1 后,如果 F_1 大于某置信水平下特定自由度的 F 的分布临界值,则拒绝 H_2 ,选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反之则选用变截距模型进行分析。

^② 注:严格来说,中部地区宜用变系数模型,考虑到与其临界值相差不多且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为分析不过于复杂,这里对中部地区的样本也使用变截距模型分析。

效应。因此,当前的公共支农支出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发挥,有必要优化公共支农支出结构,以发挥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

(3) 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各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增长相对最快,东、西部地区公共支农支出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然而中部地区作为农业经济大省的集中区域,其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这种区域性特征显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公共支农支出消费效应的发挥。

在扩内需、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转变过程中,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意义重大。依据实证分析结论,基于公共支农支出视角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有如下三点:

(1) 持续加大公共支出支农力度,长效化公共支农支出规模的增长。应进一步扩大公共支农支出的规模,确保公共支农支出的增长快于或不慢于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应设计和出台科学、高效的支农惠农的转移支付体系,通过建立公共支农支出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公共支农支出稳定增长。因为,公共支农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之上的。

(2) 不断优化公共支农支出结构,科学化公共支农资金的投向。应通过农业行政事业机构改革控制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增长,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确保新增资金主要投向有利于农村科技进步的公共领域,从而提高公共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共支农支出项目,使公共支农支出结构科学化和合理化。

(3) 依据公共支农支出的区域性特征,合理化中央和地方公共支农支出的职能界定。根据区域特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支农方面的各自职责,这对发挥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应鼓励地方更多承担公共支农职能,明确以地方为主的公共支农体制;考虑到西部区域公共支农资金可能受地方财力限制,中央政府应辅助财政支农投入,确保西部地区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和支农结构的优化不受资金短缺的困扰;中部地区公共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不显著,对中部地区则应侧重从政策角度等促使其结构优化,提高公共支农支出的效率,以发挥中部地区的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使公共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iley M. J. . 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Level [M].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1.
- [2] Ho T. W. .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a Panel Integration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 (10) .
- [3] Kwan Y. K. . The Direct Substitu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in East Asian”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431 2006.
- [4] Karras G. . .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4 (23) .
- [5] Neih C. C. and Ho T. W. . Does the Expansionary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 Out the Private Consumptio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in Panel Data [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46) .
- [6] 谢建国 陈漓高.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 [J]. 经济科学 2002 (6) .
- [7] 李永友 丛树海. 居民消费与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居民最优消费决策行为的经验分析 [J]. 世界经济 2006 , (5) .
- [8] 刘东皇 沈坤荣. 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的经验分析 [J]. 经济科学 2010 (4) .
- [9] 苑德宇 张静静 韩俊霞. 居民消费、财政支出与区域效应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J]. 统计研究 2010 (2) .
- [10] 沈坤荣 张 璟.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7 (1) .
- [11] 朱建军 常向阳.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面板模型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 (2) .
- [12] 储德银 闫 伟.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 1998 - 2007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统计研究 2009 (8) .
- [13] 李晓嘉.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分析 [J]. 经济学动态 2010 (9) .
- [14] 李燕凌 曾福生. 农村公共支出效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8) .

(责任编辑: 余小江)